

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

——基于北京市451名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调查

张晓颖 冯贺霞 王小林*

摘要: 贫困女性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是流动妇女往往遭受多个维度的贫困。本文以收入贫困 FGT 方法和多维贫困测量 AF 方法,测算了在北京市从业的 451 名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测量的维度包括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五个维度。分析结果表明,用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量,流动妇女在收入上都已脱贫;用多维贫困指数 MPI-I 测量客观的“贫”,生活水平维度最为贫困;用多维贫困指数 MPI-II 测量客观的“贫”和主客观的“困”,社会融入维度最为贫困。研究表明,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需加大力度解决流动妇女的社会融入问题,提高对流动妇女的社会包容。

关键词: 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多维贫困;社会融入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目标1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目标5为实现性别平等,向所有妇女和女孩赋权^①。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以及实现性别平等,实质上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的妇女贫困。《中共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决定》中提出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这意味着包括任何一个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妇女都要实现现有标准下的脱贫。

*张晓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邮政编码:100094,电子信箱:xiaozhi1031@qq.com;冯贺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450260491@qq.com;王小林(通讯作者),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邮政编码:100028,电子信箱:wangxl2060@163.com。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号:15ZDC026)第一子课题“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与精准识别方法研究”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资料来源: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决定》中提出的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实质上强调了到2020年消除贫困的评价标准是多维度的,不仅仅是收入单一指标。这个目标超越了福利经济学的收入视角,更多地是从微观发展经济学,即个体和农户的发展视角来评价和看待贫困的。然而,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新一轮脱贫攻坚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如何评价流动人口的贫困状况,如何精准瞄准流动人口中的贫困人口,特别是流动妇女。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过程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就业和增收最为主要的部门。那么,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女性贫困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大城市工作节奏的加快,家政服务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1)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收入贫困状况如何?(2)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状况如何?在哪些维度贫困?贫困到什么程度?(3)若加入社会融入主观福利维度,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状况如何?各维度或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如何?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从事家政服务业的451名流动妇女的问卷调查,对上述问题予以分析。

二、文献述评

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是对贫困家庭中“女户主家庭”增多、贫困人口中女性越来越多这个现象的一个概括(刘晓昀等,2004)。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将其描述为“贫困带给女性的负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Chen et.al, 2005)。这一概念说明贫困女性化不仅是缺乏收入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和政府存在对其能力剥夺和性别偏见的结果。贫困女性化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以及已发布的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都把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作为主要发展指标。

张雪梅等(2011)对2000年以来中国“妇女贫困”研究评述表明,对中国贫困女性化的研究多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也即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约5年以后开展的,多穿插在贫困研究中,少有专门研究。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理解和说明中国的贫困女性化:女性群体贫困发生率比男性群体贫困发生率高;不付酬经济中女性活动居多,妇女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新贫困有一张女性的面孔,主要有八大来源:下岗失业人群、工作中的低收入者、流动妇女、失地女农民、女户主单亲家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老龄化中的老年人群体、气候变化灾害影响的新型贫困。

流动妇女贫困是贫困女性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段成荣等(2009)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流动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但近年来逐步趋于“性别均衡化”。从2000年开始,女性已经占到流动人口的“半壁江山”,在局部省份甚至超过了男性农民工数量。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2.53亿。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必然伴随着流动妇女贫困群体的出现。因此,妇女贫困群体的细分研究,对完善中国当前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通过中国知网对篇名以“妇女贫困”、“贫困妇女”、“女性贫困”关键词检索,1987-2015年5月,共474篇相关文献,2006-2010年频次最高,202篇(图1)。在题目中出现“贫困妇

女”的文献 25 篇,“贫困地区妇女”23 篇,“农村妇女贫困”23 篇,“女性贫困”、“贫困女性”各 4 篇,“贫困女性化”6 篇。妇女贫困的研究视角,以一般性的农村妇女贫困研究为主,也涉及妇女健康、小额信贷等问题。妇女贫困按照群体的细分研究很少,农村老年妇女贫困 6 篇,留守妇女贫困 4 篇,少数民族妇女贫困 3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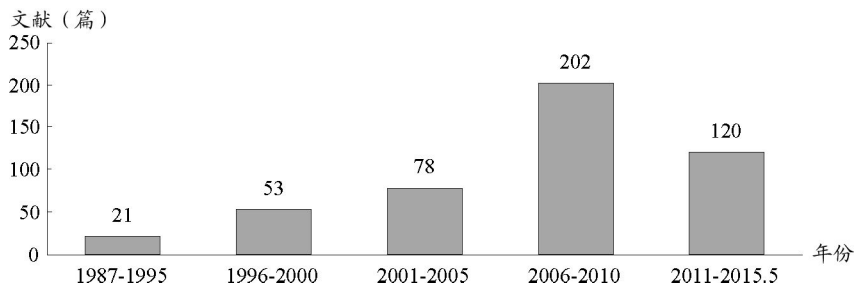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知网检索的关于妇女贫困的文献结果

以“留守妇女”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发现,2003 年首次出现“留守妇女”文献,到 2015 年 6 月,共 990 篇文章,主要涉及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心理健康、权益保护、政治参与等。关于留守妇女的研究虽然很少直接冠以“留守妇女贫困”进行分析研究,但这些文献涉及到留守妇女不同维度的贫困状况。只是这些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即解释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与留守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留守妇女造成的影响等。

关于“流动妇女”的文献从 1988 年至 2015 年 6 月,共 427 篇,主要涉及流动妇女的生殖健康、生育观念、婚姻观念、心理状况、职业选择等问题,没有发现直接对流动妇女贫困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中国学者对留守妇女的研究无论是文献的数量,还是涉及的领域都远远高于对妇女贫困和流动妇女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流动妇女贫困的维度、贫困测量、贫困成因、贫困影响以及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等的研究都还十分薄弱。家政服务业是流动妇女从事的主要职业之一,但目前对于这一行业的流动妇女贫困测量缺乏量化研究。

三、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一) 理论框架

如何定义贫困,直接涉及贫困测量的维度、指标、加总和分解的方法以及对贫困的评价和认识,甚至影响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根据王小林(2012)的研究,世界上两大类贫困定义主导着全球贫困测量:一是《英国大百科全书》将“贫困(poverty)”定义为,一个人缺乏一定量的社会可接受的物质财富或货币的状态。1901 年,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在其著作《贫穷: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按照“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购物篮子”(shopping basket)所需要的货币预算,对英国约克市的贫困线进行统计。一家六口人,一周最低的食品预算为 15 先令;加上一定的住房、衣着、燃料和其他杂物,测算出一个六口之家一周 21 先令的贫困线(Kanbur and Squire, 2001)。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2010)沿袭了这一定义,“贫困是福祉(well-being)被剥夺的现象”。因此,对贫困的定义就取决于如何测量福祉被剥夺。世界银行认为,福祉被剥夺是当人们缺乏满足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手段时发生的。世界银行按照基本需要成本方法(cost of basic needs approach)定义和测量贫困。基本需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满足充足的营养而获得一定量的食物需要,推荐每人每天摄取 2

100 卡路里营养计算;另一部分是衣着、住房等非食物基本需要;两部分加总得到贫困线(Hanghton and Khandker, 2009)。世界银行按照这一方法,对世界各国的贫困状况进行监测和比较,最为常用的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低于 1.25 美元(购买力平价)和 2 美元的标准^①。

二是阿马蒂亚·森(Sen, 1985)认为贫困并不仅仅是收入不足,而是一种能力的被剥夺现象。能力方法是多维贫困定义和测量的理论基础,森强调了“非物质的(主观的)”、“机会”等促进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Alkire 和 Foster(2007)在该认识论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的“AF 方法”,将基本能力方法转化为可测量的贫困标准。2010 年 UNDP 采纳了这一方法并在同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了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三个方面选取 10 个指标对全球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王小林和 Alkire(2009)认为,AF 方法对贫困测量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单一以货币为主的贫困测量方法扩展到更加全面的涵盖福祉和发展能力的维度。

王小林(2012)认为,汉语对“贫困”的定义要比英文 poverty 一词更能准确地捕获贫困的内涵。汉语“贫困”由“贫”和“困”两个字组成,在《说文解字》中“贫”定义为“财分少也”,实质上反映的是贫困的经济维度(或者说收入/消费贫困),也暗含着财产权利的被分割(“贫”由“分”和“贝”组成)是造成贫困的原因,财产权利的分割又涉及到政治权利。历史上凡是老百姓比较富足的朝代,大多是“井田制”实施的比较好的朝代。它表明了土地权利这一最为重要的财产或资产权利的公平分配对于摆脱贫困的重要性。“困”在《新华字典》中定义为“陷在艰难痛苦或无法摆脱的环境中”,既是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包含着个人或家庭处于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不利于其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困境。“困”反映了贫困的社会维度、环境维度、文化维度。“困”的定义十分接近森的“能力”定义。Wang 等(2016)构建了基于汉语“贫困”定义的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对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本文的理论框架沿袭 Wang 等(2016)的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并将其进一步拓展到包括社会融入这一主观福利贫困维度的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即对贫困的测量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收入/消费贫困”测量,反映“贫”;第二层次为既包括“收入/消费贫困”,也包括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反映客观的多维贫困;第三层次为包括社会融入等主观福利贫困的更广义的多维贫困,反映客观和主观的贫困。

(二) 分析方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本文认为贫困有多种表象,其内核是极端贫困(extreme poverty),按照世界银行的方法,通常用收入或者消费的方法来测量;除此之外,获得教育、健康等基本服务的能力也十分重要,用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对于流动妇女而言,社会融入这一主观福利感受十分重要,是我国包容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要内容。因此,本文以 FGT 收入贫困测量方法和 AF 多维贫困方法为基础,按三个层次分析城市中家

^①2008 年,世界银行根据 75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转型国家)的贫困线数据以及 2005 年购买力平价(PPP)将之前的 1 美元/天贫困线修订为 1.25 美元/天,2015 年 10 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将其调整为 1.9 美元/天,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线的提高,而是将 2005 年的 1.25 美元不变价标准调整为 2011 年的 1.9 美元现价标准,详见 Ferreira 等(2015)。

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贫困现状,分析范围首先是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收入贫困,其次是包括收入的多维贫困指数,再次是包括社会融入的多维贫困指数。具体方法如下:

1. AF 方法

AF 方法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算多维贫困指数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各种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中最为成熟,应用最广的方法。AF 方法的详细讨论见 Alkire 和 Foster(2007)。本文将该方法概括为:(1)各维度的福利取值(achievement)、(2)每个维度的贫困识别、(3)多个维度的贫困加总、(4)加总的权重设置和(5)分解五个步骤,详见王小林和 Alkire(2009)。

2.“贫”的分析——FGT 方法

对于流动妇女贫困“贫”的测量,本文用 FGT 方法测量收入贫困。Foster-Greer-Thorbecke(FGT)方法是通过识别各维度的被剥夺程度之后,对维度加总得到多维综合指数。最简单的加总方法是按人头计算的多维贫困发生率(H), $H=H(y;z);H=q/n$,其中 q 是在 Z_k 之下的贫困人数(即同时存在 k 个维度贫困的人数)。FGT 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对穷困的分布和剥夺的深度不敏感(王小林、Alkire,2009)。在城乡户籍制度划分下,对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收入贫困测量,采用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显然是偏低的;采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显然又是偏高的。本文对流动妇女收入贫困按两个标准测量,一是按照国家农村贫困标准,即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2 300 元(2010 年不变价);二是按照流动妇女居住地,即北京市 2012 年城市居民低保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 520 元作为收入贫困线。

3.客观“贫”和“困”的测量——基于 AF 方法的 MPI-I

Alkire 和 Foster(2007)开发了多维贫困测量的 AF 方法。王小林和 Alkire(2009)利用 AF 方法以及 2006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主要测度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 3 个维度客观方面的“困”。201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公布了 104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2015 年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利用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算了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 3 个维度的中国多维贫困指数,并纳入全球多维贫困指数(Global MPI)进行公布,也是测算客观上的“困”。一般而言,如果进行国家间比较,因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性及最不发达国家实际情况,通常选择教育、卫生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UNDP, 2010)。实质上,世界银行公布的 1.25 美元贫困人口测量的是“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测量的是“困”。

4.客观“贫”和主观“困”的测量——基于 AF 方法的 MPI-II

对于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由于户籍的城乡分割,她们与家人居住的处所分离,大多客居在客户家,将“社会融入”作为一个反映流动妇女贫困状况的维度,对消除 2.53 亿流动人口的多维贫困,全面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用“社会融入”维度反映流动妇女主观福利贫困。构建 MPI-II,包括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融入五个维度。需要指出的是,主观福利贫困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

(三) 维度选取及变量解释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中,流动妇女在城市中获得了就业机会,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实现了收入上的大规模脱贫,在流动中发现了机会,改善了生活。但从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流动妇女还存在社会融入问题。因此,根据我国流动妇女的

特点,本文从收入、教育培训、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 5 个维度选择变量。

1. 收入

我国现有的收入贫困标准分农村贫困标准和城市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 300 元(2010 年不变价),城市贫困标准通常采用各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低保)标准。低保标准因各地区生活水平差异很大,由地方来制定。因此,本文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衡量流动妇女的收入贫困线。因调查的对象为 2013 年北京市 451 名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因此选择 2012 年北京市城市居民低保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 520 元作为阈值。家政服务流动妇女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阈值视为收入贫困。

2. 教育培训

在测量全球多维贫困指数和国别多维贫困指数时,通常将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入学情况视为衡量教育贫困的主要指标,但根据家政服务业的特点,本文认为教育还应包含职业教育培训机会。姚先国和俞玲(2006)的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培训对外出劳动力成为生产工人或从事服务业具有显著影响。此外,职业教育培训也是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经过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流动妇女才有可能进入较高端领域就业从而摆脱贫困。因此本文将受教育年限低于 6 年以及是否参加职业培训两个指标作为流动妇女的教育贫困指标。

3. 健康

本文用流动妇女拥有医疗保险的情况和对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来评价健康方面的贫困状况。加入医疗保险的情况可以反映流动妇女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分散疾病风险并减少经济负担的情况,在我国现阶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缓解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可以反映调查时点流动妇女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任何一种医疗保险或者健康状况差,则视为健康贫困。

4. 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从住房、洗澡设施与卫生设施三方面衡量。居所贫困(shelter poverty)是流动人口中最重要的非收入贫困(Samanta, 2015)。住房是反映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主要支出之一。在价格、地理位置、交通和周边环境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下,流动人口多选择简陋的住所居住,这些地方没有安全的居住环境和合格的卫生设施,影响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能力。因此本文将除客户家就没有其他住房,且居住在筒子楼房、城镇里的普通平房、郊区的普通平房、地下室者视为居住贫困。不能洗澡和使用冲水厕所的分别视为洗澡和卫生设施指标方面的贫困。

5. 社会融入

对于贫困的评价,既有对每个个体在社会上所实现的客观福利的评价,例如人均纯收入是否越过国家贫困线;也有每个个体对于其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个体对于福利被剥夺感的主观感受或者评价,称之为主观福利贫困(Wang et.al, 2011)。流动妇女所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是这一群体主观福利被剥夺的主要问题。城市对流动妇女,尤其是农村流动妇女的社会排斥除了医疗、教育方面的限制外,还包括心理的影响,流动人口希望融入当地社会愿望强烈,但社会参与渠道较少(段成荣等, 2013)。因此本文将社会融入作为衡量流动妇女主观福利贫困的一个维度,它包括社会关系、城市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三个指标,具体评价标准见表 1。

表 1 维度和指标设定

	指标	阈值的设定	权重
收入	收入贫困	低于北京市 2012 年城市居民低保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 520 元 ^① 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5
教育培训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小于 6 年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0
	技能培训	没有参加与家政服务业相关的技能培训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0
健康	医疗保障	没有参加任何一种医疗保险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0
	自评健康	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者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0
生活水平	住房	除客户家就没有其他住房, 或居住在筒子楼房、城镇里的普通平房、郊区的普通平房、地下室者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5
	洗澡设施	没有任何洗澡设施, 或者自己烧热水洗澡者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5
	卫生设施	不能使用室内或室外冲水厕所者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5
社会融入	社会关系	与当地市民“从来未往”者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5
	城市归属感	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者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5
	工作满意度	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非常不满意”者视为贫困, 赋值 1, 否则为 0	1/15

四、数据及分析结果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3 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对北京市家政女工的调查。此次调查委托北京 FP 家政服务中心, 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择 532 名保姆、月嫂、钟点工、保育员等进行自填问卷, 有效问卷 451 份。主要分析结果如下:

(一) 描述统计结果

本次调查样本, 从年龄来看, 最小值 18 岁, 最大值 57 岁, 均值 41 岁, 76% 的样本集中于“35-49 岁”年龄段。农业户口占 74%, 非农业户口占 26%。其中近 3/4 来自西部省份。汉族占 96.03%, 少数民族只有 3.97%。已婚占 78.88%, 离异占 9.3%, 单身占 7.75%。

调查样本 2012 年月均可支配收入 2 978 元, 最小值 150 元, 最大值 30 000 元。月均可支配收入 1 000~2 999 元的分布最多, 占 53.30%; 其次是 3 000~4 999 元, 占 42.29%。“工资高”、“工作好找”是家政服务业农民工选择这一行的主要原因。

家政服务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 适合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妇女。此次调研样本中, 小学及以下文化占 11.39%, 初中文化占 52.56%, 高中、中专及技校毕业生占 33.40%, 大专及以上占 2.66%。92.66% 以上的家政服务员接受过 1 周以上的岗前培训。

调查样本中, 医疗保险的覆盖情况好, 50% 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7.7% 加入城镇医疗保险, 45.33% 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78.82% 健康自我评价“很好”或“好”, 18.12% 认为“一般”, 仅 3.06% 认为“差”或“极差”。在自我评价“一般”、“差”和“极差”的流动妇女中, 67.70% 处于“35-49 岁”年龄段。在流动妇女家庭中, 7.73% 的家庭 2012 年重大支出为“医疗”, 这说明在农村地区,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作用应该得到肯定。

整体而言流动妇女在城市的收入比在农村有明显提高, 居住环境、卫生设施有较大改善。以厕所为例, 流动妇女在老家不能使用“室内或室外冲水厕所”的比例高达 84.75%, 而到城市后这一指标下降到 12.03%。很多流动妇女在老家取水困难, 无法洗澡, 而到城市后不到 30% 的流动妇女要“使用公用澡房或者自己烧热水洗澡”。

^①参考 <http://shbz.beijing.cn/syzx/n214127420.shtml>。

流动妇女的社会融入问题比较严重,她们中的多数对平时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并没有归属感和亲近感,尤其是年龄较大的流动妇女。46.21%的流动妇女从来不与周围居民来往,其中,35岁以下组占13.05%,35-50岁组占80.43%,50岁以上组占6.52%。24.69%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4.56%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或“很不满意”,12.45%对当前的生活“不满意”或“很不满意”。

从5个维度11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见图2)来看,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前三个指标依次是社会关系、城市归属感和洗澡设施,贫困发生率依次为43.46%、23.06%和22.61%。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收入贫困问题不明显(4.43%),这说明仅从收入角度衡量流动妇女的贫困是片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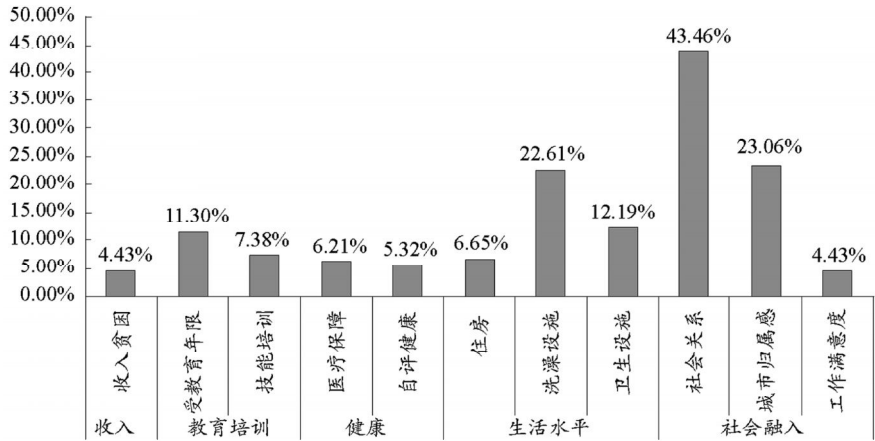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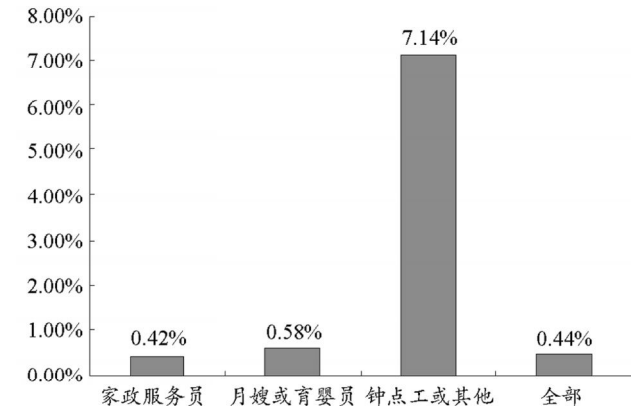


图2 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N=451)

(二) 收入贫困

进城打工为流动妇女提供了改善收入的重要途径。如果按照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人均年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本次调查的家政业流动妇女在收入方面全部脱贫;如果按照北京市2012年城市居民低保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520元计算,样本群体流动妇女中有0.44%属于收入贫困。按职业类型比较,月嫂/育婴员和家政服务员收入情况较好,钟点工或其他的收入情况较差,7.14%低于城市低保贫困线(见图3)。



注:北京市低保线是按北京市2012年城市居民低保标准统计。

图3 流动妇女收入贫困发生率

(三) 多维贫困指数(MPI-I)

本文设 $k=30\%$ 为多维贫困阈值,即如果 4 个维度中有 1.2 个维度被剥夺时即认定被调研对象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对 MPI-I 的测量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主观感受的情况下,2.44%的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表 2 的测算结果表明,样本中 2.44%的流动妇女处于多维贫困状态(H),平均剥夺程度 37.12%(A),多维贫困指数 M_0 为 0.009。从城乡分解和受教育水平分解来看,农村户口的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发生率比城市户口的流动妇女严重(2.45%:0.90%),受教育程度低的流动妇女比受教育程度高的贫困发生率高(13.72%:1.00%)。

表 2 30%阈值下的 H、A、 M_0 及分解——不含社会融入($k=30\%$)

维度	指标	全部	城乡分解		受教育年限	
			城市户籍	农村户籍	6 年及以下	7 年以上
MPI	M_0	0.009	0.003	0.009	0.048	0.004
	H	2.44%	0.90%	2.45%	13.72%	1.00%
	A	37.12%	33.33%	37.5%	35.12%	40.62%

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度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活水平、教育培训、健康、收入(见表 3),其中健康(29.03%)和教育培训(30.28%)比较接近;从各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依次为医疗保障、洗澡设施、技能培训、受教育年限、卫生设施、自评健康、收入、住房。其中医疗保险水平的贡献率较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群收入上基本脱贫,然而,一旦家庭成员患上重大疾病,生活随即陷入贫困之中。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7.73%的家庭 2012 年重大支出为“医疗”。另一方面,健康医疗保障相对较差,又进一步加重了其家庭贫困。

表 3 各维度和指标对 MPI-I 的贡献率($k=30\%$)

	指标	指标对 MPI-I 的贡献率	维度对 MPI-I 的贡献率
收入	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	6.11%	6.11%
教育培训	受教育年限	12.86%	30.28%
	技能培训	17.42%	
健康	医疗保障	19.06%	29.03%
	自评健康	9.97%	
生活水平	住房	5.81%	34.58%
	洗澡设施	18.54%	
	卫生设施	10.23%	

(四) 多维贫困指数(MPI-II)

社会融入是流动妇女贫困的短板。对 MPI-II 的测量结果表明,在多维贫困测量中加入流动妇女的社会融入主观福利指标后,其多维贫困发生率上升到 5.54%,MPI-II 上升到 0.019(见表 4)。

表 4 30%阈值下的 H、A、 M_0 及分解——含社会融入($k=30\%$)

维度	指标	全部	城乡分解		受教育年限	
			城市户籍	农村户籍	6 年及以下	7 年以上
MPI	M_0	0.019	0.006	0.022	0.067	0.013
	H	5.54%	1.8%	6.44%	19.361%	3.75%
	A	33.87%	31.66%	33.81%	34.33%	33.56%

从各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见表5)看,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融入、生活水平、教育培训、健康和收入。从各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关系、社会保障、洗澡设施、技能培训、受教育年限、城市归属感、卫生设施、自评健康、工作满意度、住房、收入,其中社会关系为17.41%,社会保障、洗澡设施、技能培训、受教育年限、城市归属感的贡献度大致相同(在10.51%~11.63%之间),收入贡献率最低,仅为2.32%。这说明城市对流动妇女的包容性还有很大改善空间,虽然不少家政服务员表示与客户的关系较好,但她们的社会活动半径小、归属感差,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流有限,也很少参与社区活动,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从本次调查来看,农业户口的家政服务员有超过一半的认为“我虽在这里工作却不属于这里”。

在对“工作满意度”的调查中发现,家政服务员主要不满意的是工作时间长和工资较低。除了日工和钟点工,大部分家政服务员24小时在客户家,处于一种随时服务的工作状态。家政服务员虽然月薪高但时薪较低。以保育员为例,她们的月工资为3500元,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小时工资约为11.21元,仅高于北京市9.89元的最低时薪标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5)。

表5 各维度和指标对MPI-II的贡献率($k=30\%$)

	指标	指标对MPI-II的贡献率	维度对MPI-II的贡献率
收入	个人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	2.32%	2.32%
教育培训	受教育年限	10.57%	21.60%
	技能培训	11.03%	
健康	社会保障	11.63%	18.63%
	自评健康	7.00%	
生活水平	住房	4.68%	23.68%
	洗澡设施	11.22%	
	卫生设施	7.78%	
社会融入	社会关系	17.41%	33.77%
	城市归属感	10.51%	
	工作满意度	5.85%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从多维贫困的视角衡量流动妇女的贫困问题可以发现,用国家农村扶贫标准来测量流动妇女收入贫困,样本群体完全脱贫;但用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贫困标准,收入贫困发生率为0.44%。

2.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4个维度测量的MPI-I表明,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生活水平维度最为贫困,然后依次为教育培训、健康、收入。这表明,在客观的贫困维度方面,流动妇女最需提高的是生活水平。按照户籍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农村户籍的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城镇户籍的流动妇女。按照接受教育年限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低的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妇女。

3.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5个维度测量的MPI-II表明,家政服务业

流动妇女社会融入维度最为贫困,然后依次为生活水平、教育培训、健康和收入。其中,最需改善的主观福利指标为社会关系,然后依次为城市归属感、工作满意度。研究表明,流动妇女的社会融入是需要重点解决的相对贫困问题,也是建立包容性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城乡分解结果同样表明,农村户籍的流动妇女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都明显高于城镇户籍的流动妇女。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受教育年限少的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程度都明显高于受教育年限多的流动妇女。

(二) 政策建议

1. 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

大规模流动妇女的存在,是在城乡户籍分割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流动妇女在城市中找到了工作,解决了就业,增加了收入,却因城乡户籍分割,在住房、子女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这是造成流动妇女“我虽在这里工作却不属于这里”的普遍被排斥感和没有归属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着力破解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使得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时享有公平的制度保障。例如,要着力尽快解决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的跨省区一卡结算问题。

2. 促进流动人口多维度城镇化,让流动妇女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本届政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在“三个1亿人”的发展战略下,不能简单地落户、盖房子,要综合考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生活水平、健康等多维度的发展需求,让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妇女全方面融入城镇。

3. 建立健全有效的贫困识别机制,覆盖流动贫困妇女

正如本文对流动妇女收入贫困测量的结果,若按照国家农村扶贫标准,流动妇女在收入上并不贫困,这样从2014年开始在全国对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大部分流动妇女不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对象。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现有的政策针对的是绝对贫困人口,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需关注多维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今后需进一步健全有效的贫困识别机制,覆盖流动贫困妇女,并从多维度进行综合减贫。特别是,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应关注流动妇女的主观福利状况。

4. 动员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强流动妇女能力建设

社会组织的草根性决定了它更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转变,更容易发挥出促进流动人口再社会化的作用。中介组织(如劳务服务公司、家政服务公司)、社会组织、社区和志愿者在增强流动人口能力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人力资源的不足,因此可以通过培训和各类活动帮助流动妇女,尤其是让流动妇女了解和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减少对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流动妇女普遍存在交流障碍,这不但影响她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与客户沟通,因此中介组织、社会组织在培训时应加强沟通能力训练。

5. 加强法制建设,保障妇女权益

目前家政从业人员在城市务工的途径主要是家政公司和朋友介绍,很多家政服务员没

有和雇主签订用工合同,属于非正规就业,因此在维权方面存在困难。即便是那些签了服务合同的家政服务员,由于她们自身缺乏法律意识,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包括哪些,因此流动妇女在维权方面同样存在障碍。政府应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联合行业协会规范家政服务市场,加大对从业人员法律培训和法律援助力度,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为保障雇佣双方的权益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 1.北京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2015:《关于调整北京市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载于 <http://zhengwu.beijing.gov.cn/gzdt/gggs/t1381895.htm> (2015-08-30)。
- 2.段成荣、张斐、卢雪和,2009:《中国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 3.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2013:《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 4.国家统计局,2015:《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于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 5.刘晓昀、李小云、叶敬忠,2004:《性别视角下的贫困问题》,《农业经济问题》第10期。
- 6.王小林,2012:《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社科文献出版社,第1-17页。
- 7.王小林、Sabina Alkire,2009:《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 8.姚先国、俞玲,2006:《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9.张雪梅、李晶、李小云,2011:《妇女贫困:从农村到城乡,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2000年以来中国“妇女贫困”研究评述与展望》,《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10.Alkire, S., and J. Foster. 2007.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OPH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7.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 11.Chen, Martha, Joann Vanek, Francie Lund, James Heintz, Renana Jhabvala and Christine Bonner. 2005.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2005: Women, Work and Povert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Report, <http://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05/1/progress-of-the-world-s-women-2005-women-work-and-poverty>.
- 12.Ferreira, H.G.F., S. Chen, A. Dabalen, Y. Dikhanov, N. Hamadeh, D. Jolliffe, A. Narayan, E. Prydz, A. Revenga, P. Sangraula, U. Serajuddin, and N. Yoshida. 2015. “A Global Count of the Extreme Poor in 2012: Data Issues, Methodology and Initial Results.”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432:1-5.
- 13.Haughton, J., and S.R.Khandker. 2009. *Handbook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67-81.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14.Kanbur, R., and L.Squire. 2001. “The Evolution of Thinking about Povert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In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Edited by G.M. Meier and J.E. Stiglitz, 183-226.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Samanta, D. 2015. “Urban Poverty in Developing Asia—Dichotomy between the Income and Non-income Dimensions: Are We not Grossly Underestimating Its Incidence?” In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Developing Asia*. Edited by Almas Heshmati, Esfandiar Maasoumi and Guanghua Wan, 80-105.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Springer Open.
- 16.Sen, A.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26-33.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The World Bank. 200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7-8.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PContentServer/WDSP/IB/2000/12/13/000094946_00092605361978/Rendered/PDF/multi_page.pdf
- 18.UNDP. 201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 11-2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19.Wang, Xiaolin, Hexia Feng, Qingjie Xia, and Sabina Alkire. 2016.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Poverty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OPH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01.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 20.Wang, X., X. Shang, and L. Xu. 2011. “Subjective Well-being Poverty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45(6): 714-731.

The Analysis of Migrant Women's Multi-dimension Poverty: Based on the Study of 451 Housekeeping Workers in Beijing

Zhang Xiaoying¹, Feng Hexia² and Wang Xiaolin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3: Information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s a major challenge fac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Migrant women, in particular, tend to suffer from poverty in various dimensions. This paper uses the FGT method (for income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the AF method (fo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to calculate the income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I)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clud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MPI-II) of 451 migrant women Housekeeping workers in Beijing. The dimensions include income, education, health, living standard and social inclus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ased on the national rural poverty standard, all the migrant women workers have shaken off poverty; The analysis of objective poverty with MPI-I indicates that migrant women are the most poverty-stricken in the living standard dimension; The analysis of subjective poverty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ifficulties with MPI-II indicates that migrant women are the most poverty-stricken in the social inclusion dimen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formula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we should redouble effor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inclusion for migrant women and improve the social inclusiveness for migrant women.

Keywords: Housekeeping Service Industry, Migrant Wom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ocial Inclusion

JEL Classification: O15, J16

(责任编辑:陈永清)

(上接第94页)

35. World Bank. 2013.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e."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D. C.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PContentServer/WDSP/IB/2013/04/04/000158349_20130404091612/Rendered/PDF/wps6400.pdf.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Farmers' Happiness: A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Li Zhiping and Zhou Yanqi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farmers' happiness in the framework of style facts-theoretical analysis-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e analysis model and a sample of 250 farmer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Sichuan, Henan, Hebei, Hubei, Yunna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and well-being by three channels of absolute income, position product and public service, which is stronger than the other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ural financial deepening policy adjustment aiming at farmers' welfare.

Keywords: Financial Deepening Policy, Farmers' Happines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ublic Service

JEL Classification: E6, O2

(责任编辑:彭爽)